

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初 稿)

复旦大学新闻系
新闻事业史教研组
一九七八年

第一章 “五四”时期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新闻事业	(1)
第一节 “五四”时期革命报刊的大发展.....	(1)
第二节 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和我国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出现.....	(14)
第三节 “五四”时期我国新闻工作的改革.....	(33)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46)
第一节 共产党成立时期的革命报刊.....	(46)
第二节 国共合作实现以后革命报刊的发展.....	(72)
第三节 五卅运动以后革命报刊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92)
第四节 北伐战争中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革命报刊.....	(112)
第五节 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间的军阀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学。无产阶级办报思想.....	(133)
第三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52)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报刊.....	(152)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在人民政权下出版的报刊.....	(166)
第三节 反文化“围剿”中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革	

命报刊·····	(179)
第四节 “一二九”运动前后宣传抗日救亡的报 刊·····	(201)
第五节 抗日战争前夜的革命根据地报刊·····	(217)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226)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新闻事业的基本形势·····	(226)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 报刊的发展·····	(230)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事业的演变·····	(260)
第四节 沦陷区中抗日报刊与敌伪报刊的斗争·····	(290)
第五节 整风运动中党报工作的改革·····	(300)
第六节 党报和革命报刊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宣 传斗争·····	(331)
第五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373)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闻事业的发展形势·····	(374)
第二节 党和人民新闻事业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 的斗争·····	(382)
第三节 解放区新闻事业对人民解放战争和土地 改革的宣传·····	(397)
第四节 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为将革命进行到底 而斗争，新闻事业的大变革·····	(429)
后记·····	(450)

第一章 “五四”时期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新闻事业

“五四”时期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的重要转变时期，是革命报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这个发展过程是与当时的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不可分的。必须循着这个历史的轨迹，才能看清这个发展的道路。

第一节 “五四”时期革命报刊的大发展

一、《新青年》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篡夺了国家政权，并演出了一幕洪宪皇帝的丑剧。袁世凯死后，继起统治的仍然是代表同一势力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这个时期，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有名无实，统治者利用辛亥革命没有着重进行思想革命的缺点，大力提倡封建道德，鼓吹复古思想，严重地阻碍着人们的觉悟。但是长期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朝代不可换，皇帝不可无的传统观念打破了，人们在思想上已经意识到每一个国民都应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皇帝的顺民和奴仆了。曾热心于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悟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而且真正的民主政治也不能仅

靠什么选举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等形式主义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来实现。他们认为，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人民自己起来，而为了要唤起民众，便要进行反封建主义思想斗争，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需要一次“国民性改造”。由这个不全面的认识出发，他们便决心着手来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进行思想启蒙工作，争取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这样便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创始者和主要阵地就是《新青年》月刊，它是这个时期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革命刊物。

《新青年》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所提出的要求已基本上包括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编辑部迁到北京，会合了在北京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展开蓬蓬勃勃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它从思想上向封建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反对君主制度，并比较完全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它指出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指出封建伦理道德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号召青年向集中体现这些道德教条的孔孟之道展开勇敢的冲击。它阐明了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也发挥了自由主义的社会伦理观念，把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的要求实行民主，实际上结合在一起。这是前期《新青年》宣传的中心内容之一。其次，由于统治阶级利用迷信心理巩固半封建的统治，阻碍有进步意义的改革，甚至借鬼神之口来反对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又发表了一系列驳斥所谓“灵学”、以自然科学为武器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的文章，进行反迷信的斗争和无神论的宣传。这个斗争实际上是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此外，提倡文学革命也是这时

期《新青年》的一个主要内容。旧文学被认为和旧道德、旧政治互为因果，因此，“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文学革命发动于一九一七年初，是反封建主义思想斗争一个重要发展。就这样，《新青年》以反封建礼教的不留情面的批判，形成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高潮。这些宣传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猛烈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思想，解除了旧思想旧道德的束缚，使青年们群起而追求新思想，为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预先开辟了道路。

《新青年》的主编是陈独秀，他首先开始了这个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斗争，向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展开了直接进攻。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复论证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而把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的主张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他的证论洋溢着对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的深刻仇恨，在反对思想敌人的论战中表现了坚决的进攻精神。鲁迅在《新青年》和同时的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杂感和小说。在他的作品中，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揭露特别深刻，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大大地加强了那些刊物的战斗力，对当时的青年有极大的影响。他由进化论出发达到了旧的必将为新的所代替的发展观点，猛烈地抨击国粹主义，揭露吃人的礼教。他的著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卓越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随感录，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也给新闻工作者留下了光辉的范本。随感录虽不是他第一次采用的形式、但他所写的随感录，具有独特的色彩，表现了人所不能及的思想深度、鲜明的战斗风格和锐利的讽刺艺术，奠定了政论杂

文的基础。自此以后，政论杂文一直是我国革命文学和报刊文章的最有力的体裁之一。鲁迅的政论除了反对封建思想的彻底性和尖锐之外，还体现了对新生事物的热爱，论战中的缜密深刻的逻辑力量和艺术上的感人力量，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章的典范。

胡适是《新青年》成员中的右翼代表。一九一六年当他还在美国留学时就和《新青年》建立了通信的联系，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在该刊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形式进行改革的一些意见。他实际进行的不过是白话文运动。他在政治上崇拜美帝国主义制度，思想上信仰实用主义。他在一九一八年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后，不断从事破坏活动，妄图篡改这个刊物的政治方向和编辑方针。

《新青年》月刊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新思潮的热诚，也推动了新刊物的出版。最初出版的是介绍新思潮的学术刊物，其中主要代表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出版的《新潮》月刊。这个刊物为北京大学学生所办，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广泛的影响。在创刊时，它举起了“文艺复兴”的旗帜，主张“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进行了反封建思想的宣传（《新潮发刊志趣旨》，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二六页）。李大钊、鲁迅都曾给它以帮助和支持，为它写稿。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新潮》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们完全错误地强调中国思想界的故步自封，“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认为，“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它不仅突出地表现了这个时期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倾向，而且表现了他们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拜倒。这个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傅斯年、罗家伦等），以后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头目，决不是偶然

的。此外，他们还强调学术救国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和《新潮》同时而性质相近的还有《国民》月刊等。在这些宣传反封建的刊物出版时，也出版了对抗这种趋势的《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号召，起了阻碍民主主义思想传播的作用。这两类刊物的对立、是当时新旧两种思想文化的对立的具体化。

在进步知识分子创办刊物猛烈展开反封建思想的斗争时，反动的北洋军阀掌握着中央政权。这是一个政治上极为黑暗反动的时期，新闻界也呈现出一副黯淡的图景。报纸多通过不同的关系依附于各派军阀的势力。在总的服务于反动统治阶级这个前提之下，办报更明显地成了政治投机分子追求利禄的工具，随时可以接受某一政派的津贴作有利于它的宣传，变幻无常、不以为耻。一九一七年张勋的复辟政变被扑灭之后，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再一次掌握了中央政治权力，拥护段祺瑞的安福系政客的报纸也便在北京新闻界中占据统治地位。它们在北京出版了《公言报》、《新民报》、《国是报》、英文《北京日报》等，并把持了北京报界的联合组织。它们在各地也出版了一些报纸，并收买了一些报纸作为它的御用工具。依附于军阀的其他各政派也办了一些报纸，例如交通系梁士诒派有《民福报》、政学系有《中华新报》等。这些报纸在思想上是封建主义思想的维护者，在政治上虽然也彼此攻讦，时有争论，但都是军阀政客间矛盾的反映，实际上是一致服务于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在国民党报刊被袁世凯封闭之后，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一部分人，于一九一六年开始在上海出版了《民国日报》，利用租界的掩护，进行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宣传。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报纸宣传以强调维护法统为

中心，不能贯彻坚决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态度，没有提出鲜明的适合革命要求的政治纲领。对前期新文化运动也没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反而曾长期刊载一些黄色庸俗的材料，企图以此吸引读者。总之，袁世凯篡夺政权以后，报刊上的政治斗争一时曾陷于沉寂。《新青年》等刊物所进行的思想斗争预示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即将到来。

二、十月革命对中国报刊宣传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的许多报纸上，都以“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字样，报导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关于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在一九一八年二月间的中国报纸上也有着反映。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十月革命的影响所及，使我国报刊宣传出现了新的局面。

报刊上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这一工作是和李大钊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起来宣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委员会的委员，是这个时期的最优秀的政论家之一。他曾积极地参加了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政论文章《青春》、《今》、《新的、旧的》等，除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之外，并用初步的辩证观点和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热情鼓舞了人民。十月革命胜利

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使他开始成为一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一九一八年七月，正当段系军阀把我国拉进了反苏干涉战争中的罪恶活动遭到了人民的反对时，他在当时的一种学术刊物《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宣传了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同年十一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们利用德帝国主义的失败，侈谈“公理战胜强权”来愚弄人民的阴谋诡计。他把欧战的结束看成“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的胜利”。他热情地赞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弥漫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并满怀信心地向中国人民宣告：“俄国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文章把当时革命报刊上反对封建的思想斗争和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也在我国报刊的历史上揭开了以马克思主义宣传为特征的新页。

这时，李大钊同志还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工作，当时陆续出版的进步报刊有许多得到了他的积极帮助和指导，有些只是由于他的支持才能出版。他还参加了许多青年社团的组织工作。

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传播，新文化运动无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便都不能不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思想上，它已开始带上了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新性质；在政治上，由于欧战结束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促使我国人民也迫切地要求政治局势有必要的转变，开始从辛亥革命以来的怀疑苦闷中看到了出路，而使曾一度沉寂的政治斗争又积极起来。在这以前，以《新青年》月刊为中心的

先进知识分子是以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为根本之图，而强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见《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一卷一号通讯栏，《答王庸工书》）。但到了这时，反军阀的政治斗争已经成了迫切的任务，继续坚守不批评实际政治的原则已经不行了。由于一方面《新青年》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大型的《新青年》月刊也不便于进行政治鼓动。因而李大钊和陈独秀便另办了以反映迫切的政治性问题为中心的、具有较大鼓动性的小型周报《每周评论》。这个刊物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四开四版。实际上是一张小型的政治报纸。《每周评论》出版后，便以反对军阀的宣传和巴黎和会及欧洲革命高潮的报道为两个宣传中心，在揭露当时皖系军阀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编练“国防军”，准备实行武力统一的阴谋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革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力图把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与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每周评论》的创办正好从报刊的发展上表明了这一点。它和注重新思想宣传的《新青年》月刊一起，起了相互补充的作用，两者同成为“五四”时代起了重大的革命影响的刊物。

在革命知识分子着手出版进行政治鼓动的报纸的同时，一部分改良派政团的报刊也起了变化。一九一八年，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政团研究系在政治上转而处于失势的地位，与当权的段派发生了冲突，因而促成了这一派报纸的立场转变。这一年九月，北京有八家报纸因为刊载段祺瑞大借款的消息而遭封闭，其中便包括这一派的《晨钟报》、《国民公报》。十二月，《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一九一九年二月，《晨报》改组了第七版，吸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

思想的分子李大钊同志参加工作，明显地转而倾向新文化运动。先后同时采取了类似的态度还有属于同一系统的北京《国民公报》和上海《时事新报》。

以思想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与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开始出现，人民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起来，这引起了北洋军阀统治者和整个封建势力的极大的恐惧，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和迫害接踵而至。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的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对新思想的群起而攻之的非难，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的大旗，表示了反封建礼教的无畏的决心。它写道：“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赛二先生”——引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绝不推辞”。这个誓辞似的声音，体现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坚强的战斗性。这时反动的报刊组织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攻，北京《公言报》和上海《新申报》发表了林琴南的《与蔡鹤卿太史书》和笔记小说《荆生》，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反动派同时制造谣言威胁他们的安全，企图利用安福系控制的“国会”进行直接的迫害。广大人民反军阀的斗争使两种报刊之间的斗争激烈化起来，展开了“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在这个论战中，不少报纸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评论，从思想自由的角度反对这种摧残自由的反动言论和行动。

三、“五四”运动中的报刊宣传和革命报刊的大发展

在人民反军阀的斗争逐渐高昂时，一九一九年四月末，

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帝国主义利益全部交给日本。这个消息传来我国，即暴露了北洋军阀政府亲日卖国的更多的事实，又使欧战后曾流行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正面冲突开始了，这个斗争立即在报刊上有了充分的反映。进步的报刊积极参加了这个斗争，《每周评论》和其他一些报纸以大部分篇幅刊载关于群众运动的报道，发表评论支持群众的要求。《每周评论》向读者着重地指出，反对的锋芒不应该只针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个人，而应看到真正的敌人是整个军阀统治。它又直接揭穿协约国的帝国主义真面目，直接指斥了威尔逊的欺骗。《每周评论》在积极支持群众的示威运动时，从正澎湃于俄德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得到了有力的鼓舞。它写道：“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权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它打倒，他们不仍旧是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天天怎样把公理挂在嘴上叫喊，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怎样？”（《每周评论》第二三期），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进行的，当时的革命报刊实际上向人民发出了学习俄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的榜样来进行打倒军阀的革命斗争的号召。在这个运动中，它们还反击了各种反动报纸对群众运动的诬蔑。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公然诬蔑群众运动是“威迫治安”。代表北洋军阀的《公言报》把这个运动看成“铲伦常、复孔孟”的结果，他们满含杀机地准备对群众运动实行血腥镇压并由此扑灭整个思想运动。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梁漱溟

则和他的主子配合，阴谋地表示赞成“交付法庭处理”。进步的报纸起来驳斥了所有这些澜言，保卫了人民群众的举行政治示威的民主权利。

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进步群众团体，还新出版了一批报刊进行五四运动的政治鼓动，如北京学联的《五七》日刊，全国学联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上海）和上海学联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等。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一些保守的资产阶级报纸如《申报》等，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怒潮前面，不能不表示某种程度反对日本的态度。上海的报纸曾宣布不收日商广告，不刊登日商的船期、汇市、商情，以示追随群众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斗争。但是这一类报纸不是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六三运动之后，北京政府决定用撤换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的办法来缓和人民的愤怒，当这三人去职的消息一传到上海时，这类报纸便马上号召复市，反映了它们的资产阶级的严重的不彻底性。

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时，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运动的展开。因此，随着政治鼓动和思想宣传的迫切需要，促成了革命报刊在全国各地的迅速发展。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上革命报刊的第一个大规模发展的时期。风起云涌般出现的革命报刊，据当时人估计约有四百多种。这些报刊包括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最重要、数量最大的是各地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和其他学生报纸。在重要城市中，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几乎都各有自己的报纸，有的地方甚至连小学生都出版报刊。在这些报刊上反映了青年群众追求新思想的热情，并把政治鼓动和思想宣传结合在一起，在当时遍及各地的群众运动中起

了一定的作用。

这个时期中，有许多知识分子还组织社团学会，出版报刊，进行新思潮宣传。这是迅速发展中的革命报刊的另一类。例如，五四运动中有过广泛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一九年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广泛介绍了各种学术文艺部门和流派的学说思想，稍后又出版了《少年世界》月刊，都引起过广泛的注意（在一九二四年因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彻底分裂而停刊。）

五四运动也推动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着手扩大他们的宣传工作。孙中山赞美五四运动，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须赖于思想之变化。”（《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上册，第四二九页。）与这一派有密切关系的《民国日报》原来没有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也积极宣传新思想，创办了新的副刊《觉悟》。同时这一派还在这时创办了理论刊物《建设月刊》和小型周报《星期评论》。这些报刊支持和响应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起过积极的作用。不过，这时孙中山的政治观点还没有重大的改变，在他执笔的《建设月刊》发刊词中，还认为当时的内忧外患不过是“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因此，他们要办刊物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这个思想在一定限度内规定了这一派报刊的主要方向。他们也曾发表过一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建设月刊》甚至还全文译载过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但那也只是和大量的各种政治思想，乃至市政建设学说之类，一起作为可资借镜的建设思潮之一的介绍，与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有所不同的。而对于这一派中的一部分人说来，其实

际的意图更在于用这种方式欺骗人民，并从中找出抵制马克思主义真正传播的方策，是包含着反动的目的。这一派报刊这时的强调建设，忽视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已不能再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又一有力说明。

“五四”时期风起云涌般出现的进步报刊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疯狂的镇压。“五四”运动中，北洋军阀采取了各种办法来扼杀新闻出版自由。他们封闭了许多革命刊物，包括《每周评论》和《新社会》等，连天主教的报纸《益世报》和改良派政团的《国民公报》也曾一度被查禁。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报纸《五七》日刊，因北洋军阀压迫印刷所制止代印而停刊。北京《晨报》等被军阀政府派人监视发稿，逐条检查，以后也一度被下令停止出版。帝国主义是这种迫害行为的参加者和主使者。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直接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惩办报纸。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当局通过了取缔报纸的议案。一九一九年七月，《民国日报》曾被罚停刊二日，即是明显的例证。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原来在“五四”运动前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口号而团结起来的统一战线这时起了分化。革命的民主主义报刊除一部分被军阀政府胁迫停刊，一部分因经费等原因而夭折之外，从中也发展了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刊物和最初的工人报刊。通过这些刊物，马克思主义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对准备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原来参加了统一战线的另一部分报刊却转到反动方面去了。这些报刊中，有一部分是原属于改良派政团的报纸，这时，他们敌视日益增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又企图和军阀政府保持妥协的关系，便完全回到原来的依附于军阀政权的立场上去，并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宣传，终于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集团的助手。研究系的《时事新报》是最早走上了这一条道路的。《晨报》以后的发展，也是如此。另一部分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刊，也迅速丧失了进步作用而趋于夭折了。例如《新潮》月刊，在“五四”运动之后，便在胡适的指导下，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实际上是越来越以宣传实用主义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为中心。到了一九二二年，便因主持人纷纷出国留学而停刊了。这种分化是与五四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一致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五四”统一战线分化的组织上的表现。

“五四”时期是我国革命报刊的大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革命报刊继承和发展的我国报刊的民主传统，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报刊的直接先驱者。在这个时期中，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对我国报纸工作的改进也有过贡献。但历史事实表明它们没有能够坚持到底，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彻底担负起了发展我国报刊的根本传统的的光荣任务。

第二节 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 和我国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出现

一、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的创办

五四运动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出现，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的创办。

《湘江评论》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在湖南长沙创刊。当时，湖南是一个革命的先进地区，领导这里的革命运